

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与华侨

何科根 胡波

内容提要:孙中山一生始终与华侨社会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与华侨接触交往的过程中,孙中山不仅得到了他们大量的人、财、物等方面的支持,而且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华侨社会的思想观念、情感倾向、心理状态等,成为孙中山中国近代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华侨对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认识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辛亥革命时期,大批海外华侨在孙中山等人的影响下,积极支持、参与祖国的民主革命运动。民国建立之后,华侨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纷纷回国投资实业、兴办教育、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支持祖国建设。这一切,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孙中山与华侨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而又引人注目,学术界对此早就进行了严肃认真和深入细致的研究,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华侨是中国革命之母,他们积极支持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他们强有力的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就难以迅速获得成功;另一种意见认为,华侨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是受了孙中山的影响才产生和迸发出来的,没有孙中山的宣传鼓动和组织领导,就没有“华侨是革命之母”的盛誉。这两种观点反映了共同的研究兴趣:重视政治态度和革命活动的研究。这种研究兴趣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认识上的错觉,以为华侨社会没有自己的思想理论或者他们的思想主张并不重要,孙中山的思想主张的形成与华侨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事实上,华侨社会的思想倾向和心理状态、以及行为表现,对孙中山的思想理论的形成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本文拟就“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与华侨”这一问题作一尝试性的探讨,以求教于同行。

一、孙中山与华侨社会

孙中山一生始终与华侨社会保持着十分密

切的联系。他本身就是一个华侨,长时间生活在华侨社会里。据统计,在他59年的生活中,就有31年是在海外而且主要是在华侨社会里度过的^①。在这3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孙中山先后多次到过夏威夷、美国、加拿大、日本、南洋、英国、法国等地^②。他每到一处,必然与当地的华侨取得联系,而华侨也始终把孙中山当作自己人和知心朋友。华侨社会事实上成了孙中山学习、生活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基地。

孙中山与华侨社会接触并成为其中一员的最初机缘无疑与他的哥哥孙眉有关。1871年,孙眉去檀香山,“最初和郑强同在一个华侨办的菜园里当工人,月薪十五元,他每月汇寄十元回家,……后来孙眉跑到茂宜岛去垦荒耕种,开始进行少量的雇工剥削,慢慢地积累起资本,开设了商店和牧场”^③、“渐至富厚”^④,成为华侨资本家。孙眉劳动致富,给他的家庭尤其是孙中山带来了“好运”。1879年,孙中山去檀香山,先后就读于意奥兰尼学校和火奴鲁鲁阿厚书院。在学习期间,孙中山不仅了解了西方各国的历史文化,知道了华盛顿、林肯其人其事,对中、英文和军事体操、救火会以及基督教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

且也结识了华侨子弟唐雄、李弼、钟工宇等几十位同学,对檀香山华侨创业的历史、日常生活、思想观念、心理状态等也有了初步的印象^⑤。在以后的岁月里,孙中山又六次去檀香山,累计在檀香山的总时间是7年^⑥。在那里,孙中山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与保皇派康有为、梁启超展开过激烈的针锋相对的论战。在那里,孙中山还组织了中华革命军,改组《檀山新报》,加入海外洪门,发表《驳保皇报书》和《敬告同乡书》,向华侨社会宣传革命排满的思想。可以说,檀香山华侨社会是孙中山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南洋华侨社会和南洋华侨,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当中,亦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1900年以后的十几年内,孙中山曾先后七下南洋,不仅与这里的华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且逐步转移了革命活动中心和革命依靠对象,使南洋在同盟会成立以后实际上成了“革命活动的策源地和根据地”^⑦。据统计,自1900年夏至1911年的12年里,孙中山先后到过法属越南河内、海防、西贡、堤岸、美荻、沙的,英属马来半岛的星洲、芙蓉、吉隆坡、怡保、太平、槟榔屿,以及泰国的曼谷等地。其中曾二至河内,四至海防,十一次去西贡、堤岸,一次至美荻、沙的,九次去星洲,两次至芙蓉、吉隆坡,一次去怡保、太平,三次到槟榔屿,二次去泰国^⑧。在南洋辗转活动的时间累计大约3年零10个月^⑨。从停留时间和活动的范围上看,南洋华侨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大本营。在南洋,孙中山不仅获得了华侨中下层一次又一次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方面的支持,而且也与华侨中的精英分子和爱国侨领们结下了深情厚谊。如新加坡华侨黄乃裳、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越南华侨黄隆生等人,就与孙中山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极不寻常的交往,甚至成为孙中山革命组织活动的中坚力量^⑩。在与南洋华侨中的爱国积极分子的交往接触中,孙中山对华侨社会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至于北美洲的华侨和华侨社会,孙中山也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根据陈锡祺先生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一书的记载,孙中山曾五次周游北美洲的加拿大和美国各地,在那里停留的时间累计共有2年零3个月,与当地的华侨和华侨社

会也有过较频繁的接触。在北美洲,孙中山不仅改造了致公堂,争取了洪门兄弟的支持,而且还在那里先后成立了同盟会分会,几乎控制了那里华侨社会中的大众传播媒介,影响了社会舆论。美洲华侨对孙中山的态度也由过去视为大逆不道转变为热心支持孙中山,踊跃参加同盟会和为革命捐资出力^⑪。

相对美洲、檀香山和南洋这三个地区的华侨社会来说,欧洲和日本等地区的华侨与孙中山的关系就显得不够亲密。尽管孙中山在这两个地区停留的时间累计起来也有9年多(其中在日本7年零10个月,欧洲1年零8个月),但现有的资料显示出孙中山接触得更多的对象不是华侨而是当时在这两个地区的留学生^⑫。这一方面是由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的迅速增长和革命热情的不断高涨,引起了孙中山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朝野人士对孙中山的思想主张和革命活动所给予的支持,在孙中山看来是他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因而相对说来忽视了对当地华侨的宣传鼓动和组织领导工作。不过,在早期,孙中山对日本华侨社会曾有过较多的接触,如1895年1月孙中山取道日本返回香港时,曾与横滨华侨中颇负盛名的冯镜如、冯紫珊兄弟及谭发等人建立了联系^⑬。随后在横滨亲自组织成立了横滨兴中会,当时会员有17人^⑭。在以后的岁月里,孙中山与日本华侨社会也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只是相对来说这种联系显得有些松散而已。同样,孙中山与欧洲华侨社会的接触也比较少,其原因主要是欧洲各国华侨人数少且又比较分散,在短时间内难以有更深入一步的认识和接触。

总之,从13岁去檀香山到59岁病逝,孙中山与华侨社会和华侨中下层始终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与华侨接触交往的过程中,孙中山受惠良多,不仅得到华侨大量的人、财、物等方面的支持,而且从华侨身上孙中山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华侨社会的思想观念、情感倾向、心理状态等,甚至直接成为孙中山的中国近代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华侨社会与孙中山近代化思想之形成

长期在华侨社会里生活,经常与华侨团体和

个人接触,耳濡目染,孙中山的思想、行为、个性等难免受其影响。孙中山的中国近代化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以及内容和表现形式等,在一定程度上就与华侨社会有关。

首先,华侨创业的历史和在海外的不幸遭遇,刺激了孙中山,使他萌发了振兴中华,革新社会的思想。

还在很小的时候,孙中山就从乡亲们那里得知华侨出洋谋生的许多趣闻逸事和难以言说的不幸遭遇。1879年,孙中山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去檀香山的梦想。当他看到檀香山的邮政事业、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法治,以及当地人的优越生活时,便大发感慨,逐渐产生了建设家乡和改良祖国的念头。他自己就说:“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传西校,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⑮

但是,思想观念的产生常常有着更为深刻的动因,有时连思想者本人也难于分清引起思想的最初触媒。孙中山亦不例外,在促使他立志改良祖国、拯救同群的动因之中,华侨在海外所受到的种种艰难困苦和不公平的待遇为其中之一,但并没有引起孙中山的注意。虽然早期在檀香山学习生活的五六年时间里,檀香山华侨尚能在当地政治经济中争得一席之地,境况较好^⑯,但其它地区华侨所受的非人待遇和不幸,孙中山也时有耳闻。敏感而富有同情心的孙中山自然受到刺激,拍案而起,这从他后来(1912年3月19日)以大总统的名义命令外交部妥善保护侨民及杜绝贩卖“猪仔”的办法中就能窥知一二。他说:“查海疆各省,奸人拐骗‘猪仔’,陷入涂炭。……又侨民散居各岛,……屡被外人凌虐,然含辛茹苦,挚爱宗邦。……除令广东都督严禁‘猪仔’出口外,合亟令该部,妥筹杜绝贩卖及保护侨民办法,务使博爱平等之义,实力推行。”^⑰在发布保护华侨的法令时,孙中山更加明确地表示:“文毕生心力,尽瘁国事,间关跋涉,几遍五洲,……凡我侨胞直接间接受受政治上之痛苦,罔不洞知。每思专制推翻,民治发展之后,稍尽保护之责,藉纾痛苦之情,耿耿此心,无时或息。”^⑱“就职以来,凡所

措施,咸以发展民治为前提,保护华侨为职志。”^⑲由此不难看出,孙中山立志振兴中华与他长时间在华侨社会中生活,了解华侨的苦乐辛酸,深知华侨的心理和需求,同情他们的遭遇和不幸等等有关。

其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侨社会思潮是孙中山近代化思想孕育和形成的源泉之一。

从思想发展的继承性来看,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实际上是对华侨社会的“反清复明”的民族民主思想,关心祖国建设、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思想,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思想的一种继承、发展、超越和创新。华侨最初的出国动机比较复杂,但一到了国外,共同面临的问题迅速掩盖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动机。共同面临的被剥削、被奴役、受排挤、受歧视的处境,使他们领会到了祖国的强盛衰败对于他们的作用和意义,产生了振兴中华、建设祖国和家乡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孙中山长期在华侨社会中生活,华侨社会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观念自然对他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华侨渴望祖国强盛的心理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想主张,对于好学多思、思维敏锐、善于吸收和综合的孙中山来说,无疑起了引导、暗示和启发作用,甚至成为孙中山中国近代化思想产生的酵母和标本。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说:“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风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⑳可以肯定,华侨渴望祖国早日强大昌盛,使他们在海外扬眉吐气的心理,以及有关振兴中华的途径、方式方法的思想言论,对孙中山构筑中国近代化的思想体系无疑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是对华侨社会爱国主义思潮的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和具体化。

从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来看,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实际上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海内外侨情、国情、世情的综合反映。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由于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文化保守带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引起了全民对现状的不满与担忧,“愤悱”、“讲画”、“变力”成了世纪之交的先驱者们共同思考的问题,御侮自强成了中华民

族的共识和心声^①。而在海外，华侨所受的苦难也越来越沉重，“旧金山之埠，华民住房则有十苦之诉，洗衣裳则有六不近情理之诉，统大小各埠工商人等，则有七难之诉”^②。

其它地区华侨的处境比旧金山华侨也好不了多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华侨对自己的处境深有感触，认为“我辈今日所以受此惨毒者何也，为国之不强”，“我国能维新自强，何至有今日之事。”^③因此，他们总是想把中国造成一个体面的国家^④，并且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提出了改造中国，振兴中华，挽救民族危亡的各种方案，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了国内外各种旨在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如陈嘉庚、陈宜禧、张榕轩、张耀轩、邓荫南、孙眉、司徒美堂、陈楚楠、黄乃裳、杨著昆、杨仙逸等等，就是华侨爱国的典范。活跃在这样一个海内外中国人都热心于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的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里的孙中山，其思想主张、价值观念、社会理想、政治抱负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受到的冲击自然不可低估。

再次，华侨在海外所取得的成就和热爱祖国、家乡的政治、经济、文教事业的言行，不仅丰富了孙中山的中国近代化思想，而且也使孙中山为实现自己的近代化理想而努力的信心更加坚定。

华侨在海外虽然受这样或那样的不幸和困苦，但勤奋、刻苦、俭朴、顽强的精神品格仍然使他们中的佼佼者战胜困难，走向成功之路。华侨一旦事业有成，他们便积极支援家乡和祖国的建设。19世纪下半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出现，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华侨投资兴办的企业。秘鲁华侨黎某在广州开设的进出口商店，1872年南洋华侨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创办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1890年美洲华侨在广州投资创办的电灯公司，1892年印尼华侨张振勋在山东烟台创办的张裕酿酒公司，爪哇华侨张煜南投资兴建的潮汕铁路等就是典型。1910年通车的漳厦铁路，也主要是华侨投资兴建的^⑤。据不完全统计，1864~1913年，华侨汇款共131600万元^⑥，其中1903年的汇款总数就达11370万元，占中国国际收入总额（66170万元）的17.8%^⑦。与此同时，华侨们认识到“近代列国争强，要在世界上立

足，教养二字很重要，国民失养，就无以为生，国民失教，就难以争存”^⑧，提出了“教育救国”的口号，纷纷回国捐资办学。如容闳创办的香山县屏乡甄贤义学，吴纪蕃创办的诗坂、诗整、进化、嘉福等学校，陈嘉庚创办的惕斋学塾，左燮亭创办的三堡学堂，吴锦堂创办的锦堂学校等，为普及教育，传播西学，提高国民素质，促进近代化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⑨。

华侨对革命的支持，以及对实业和教育的热情，对既有远大理想而又注重实际的孙中山来说，不啻是一种强壮剂。孙中山一向把财力、物力、人力和舆论看作是革命和建设，乃至近代化事业的根本保障。他说：“我国所缺者，资本也，才能也。”^⑩并强调“务希达合华侨之财智，以兴发祖国利源之目的”^⑪。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十分重视华侨资本和华侨中的有智有识之士在近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便积极着手吸引侨资。1912年2月孙中山支持华侨吴世荣发起组织“华侨联合会”，作为沟通政府与华侨之间的桥梁，其宗旨就是“以联合国外华侨，共同一致，协助祖国政治、经济、外交活动，及研究侨民之利弊，解除外人之苛待”^⑫。同时，孙中山还派代表去南洋等地华侨社会中筹款创办中华实业银行，以便利华侨经营内地实业。后来又建议在上海成立华侨会馆“为侨胞与内地交际之机关，凡工商事业，藉此地以为调查联络之所，使华侨尽知各种天然利源，生财机会不致为外人捷足。”^⑬事实上，华侨在辛亥革命时期和民国初年，给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经济上的支持是相当大的。据估算，从1895年到1911年4月广州起义，华侨给予了约62万元的经费支持^⑭。从1911年11月9日到1912年5月31日，广东军政府得到了各地华侨约180万元的援助^⑮。1913年军政府教育司长钟荣光也说：“反正以后，外埠华侨，多挟资本回国，谋兴农工商矿之利。”^⑯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和对兴办实业、教育等的兴趣，一方面在客观上支持了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主张，使孙中山的近代化构想有了许多实证性的材料；另一方面，也使孙中山在探索实现中国近代化的途径、方式方法问题过程中，受到鼓舞和启发。

三、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对华侨

的作用和影响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③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在华侨社会和近现代中国历史变革中的作用亦是如此。

早期出国谋生的华侨大多数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农民,他们最初的动机只是为了赚钱、回家、过安稳富足的生活,但是当他们踏上近代化倾向比较明显的或西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土地后,他们亲身体会到的是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现实威力。那代表西方文明的轮船、火车、汽车、电讯、飞机、大炮、机器,与中国的三纲五常、五经四书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存在”与“虚无”的对比。在华侨的心目中,似乎西方文化更符合他们本能的要求。正如有人所分析的那样,“对于生活于南洋的华侨来说,西方文化不是一种抽象的思想,而是一种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左右他们生活各方面的现实力量。诚然,事实上很多华侨都有保存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但他们同时不能不看到只有采取了先进的西方文化才能与洋人竞争,才能与洋人立于平等的地位。”^④正是基于对西方近代化的这种感性认识和切身体验,华侨对任何一种学习西方,志在振兴中华的思想、学说和具体方案,都有一种平静、宽容、支持甚至参与的态度。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既是对西方近代化所进行的一次经验总结,又是学习西方,将西方近代化经验中国化的一种理论探索。因此,他的近代化思想主张很快地得到华侨中大多数人的理解和认同。孙中山就说:“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明白本党的主义在先,所以他们革命也是在先。每次革命,都是得到海外同志的力量。”^⑤“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共,或输财以充军实,或奋袂而杀国贼,其对革命之奋斗,历十余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一字,以长留于国人之脑海。”^⑥

但是,华侨对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认识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一方面华侨本身的文化水平和认识能力有限,在认识上不可能一步到位;另一方面,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他的近代化思想在当时

看来也难于在实践过程中进行具体操作。真正促使华侨接受和支持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的因素有二:一是心理因素,一是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

就心理因素而言,自强御侮和求实逐利心理,是华侨接受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主张的直接动因。有人就曾深入剖析了华侨的这两种心理:“海外华人关怀家乡的发展,是很自然的心理。但华侨及土生华裔在美国受排挤与歧视,更进一步促使他们关注中国的政治局势,甚至直接参加中国的政治活动。主观动机是帮助改革中国社会,扫除通往现代化路途上的一切障碍。中国富强起来,一方面可以给予海外华人,尤其是新兴的华侨资产阶级及新型华侨和土生华裔知识分子,在中国有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声誉提高,也可以帮助改善华人在居留国的待遇与社会地位,因此,在这大前提下,尽管各阶层的不同的利益,各人对事物有不同的见解而产生不同程度的表现,但美国华人对于中国政治立场,基本上不会脱离反对帝国主义及反对封建制度这两个原则。而能够以这两点为号召的政党,一般是会得到他们的支持的。”^⑦美国华侨的这种心理在当时世界各地华侨社会里颇具代表性。

从外在因素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以及康梁保皇派的海外游说,是华侨社会从愚昧、保守和落后走向开放、文明、进步的主要因素。尤其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海内外长时期从事革命宣传和组织领导工作,不仅加速了华侨的祖国认同,而且促使华侨从改良保皇走向民主革命。孙中山特别重视舆论宣传,香港《兴中会章程》中就有“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才,……皆当惟力是视,逐渐举行”的条文^⑧。兴中会时期,在海外宣传爱国革命的报刊共11种,同盟会时期则增至41种。除了在日本的主要由留学生和革命党人所办外,其他则均为华侨和革命者合办^⑨。同时,孙中山还特别重视华侨教育,支持和组织创办了许多华侨学校,对华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华侨的文化素质。此外,孙中山经常在华侨社会公开发表演说,宣传革命,受到华侨的热烈拥护。每次演讲“座为之满,听者鼓掌不已,继以顿足”,“每次演毕,鼓掌吹口之声,震动檐壁,可谓盛矣”。通过孙中山

的讲演宣传之后,“人心倾向革命,如水就下。即平时最不喜谈革命者,至今亦连声诺诺,以革命事业为救国之唯一上策”。⁴³可以说,没有孙中山等人的不懈努力,就不可能有华侨的革命参与。

在孙中山看来,推翻清朝统治,结束沿袭了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只是为中国近代化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而建立民主共和国,实现工业、农业、文化和人的近代化,才是最根本的目的和任务⁴⁴。如果说在推翻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扫除近代化的障碍问题上,华侨们尚有认识上的偏差的话,那么,发展实业,振兴中华,实现近代化,则是他们的共同心愿。所以,孙中山的发展实业、兴办教育、塑造新人格等近代化思想,很快在华侨社会中得到了共鸣。

辛亥革命胜利后,华侨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纷纷回国投资实业、兴办教育、改善医疗卫生条件,但是,孙中山领导的南京政府只是昙花一现,孙中山曾向华侨许下的种种诺言和制定的侨务政策因此也就成为泡影。尤其是政局动荡,战乱频繁,以及地方官员对华侨的偏见,严重影响了华侨回国投资的积极性,对此,孙中山深感痛心。在致福建一地方官员的信中他强调指出:华侨“皆有意为故乡进步发展,唯以从前闽省官吏多抑勒归国华侨,以致闻风却步。此时兄能对归国华侨竭力保护,助其振兴实业,则必联袂归来。”⁴⁵同时他还于1916年计划“组织一宏大报馆,一使人民知共和为世界最良之政治;二使人民知人权之可贵,不至仍前放弃,被人蹂躏;三竭力调查实力,供华侨归国之引导。”⁴⁶华侨后来在国内投资总额不断增长的事实⁴⁷,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孙中山的努力没有白费。

对华侨社会和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说明孙中山始终把华侨看作是中国近代化的生力军;而华侨在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的激励和指引下,也名副其实地充当了中国近代化的开路先锋。一位华侨学者就曾深有感触地说:“百数十年来,所谓西洋化的运动,华侨所占的位置特别重要,华侨所给予祖国的贡献,特别繁多……从物质的西洋化方面来看,凡到过闽粤省的人,都能明白福建的泉州,广东的潮汕、广州、四邑以至海南岛,无论是城市乡村,在物质方面的设施,比起华北各省有天壤之别。但是这些西洋化的物质的设

施,十九是出自华侨之手。此外又如所谓新经济的组织,而特别是政治革命的运动之得力于这般华侨更是明显,……在教育上,厦门大学,集美学校,以及广东像岭南培正以至许多的公私立学校,大多数都直接或间接与这般华侨有很大的关系。而闽粤一般学子之在学校求学者,也很多的直接或间接仰赖于这般华侨的接济。他如日常生活之西化上也很受华侨的影响。在广东的四邑,平常说话且夹入一二英语者,至于言语之直译音者,像士担(邮票)、燕梳(保险)等名词差不多成为妇孺所常用,又如工商业种种的发展上,得力于他们者也多。”⁴⁸不过,华侨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既是其自觉的和无意识的两种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又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和近代化思想长久影响有关。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合力作用,使华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际上成为孙中山中国近代化思想的忠实执行者和揭幕人。

注:

①② 参见胡波、林有能:《孙中山与海外香山人》,载《孙中山与华侨》,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③⑤ 参阅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10、24—32。

④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总理年谱长编初稿》第29页,1932年9月印本。

⑥ 据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统计,这六次分别是1884年11月;1894年10月;1895年11月;1901年4月;1903年10月;1910年3月。

⑦ 《胡汉民先生文集》,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1978年版,第2册第455页。

⑧ 蒋永敬编:《华侨开国革命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257—259页。

⑩ 蒋永敬:《辛亥前南洋华人对孙中山先生革命运动之支援》,载《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社会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86年版;并参阅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中的陈楚楠、张永福二人的回忆文章。

⑪ 张英:《孙中山与美国华侨》,载广东历史学会编《华侨论文集》(二辑),1982年5月印行。

⑫ 参阅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五、六、九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⑬⑭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第43、44页。

⑮⑰《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9、252、22页。

⑯⑱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版;刘伯骥:《美国华侨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版。

⑲《国父全集》第三册,第787~788页。

⑳《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页。

㉑章开沅:《愤悱·讲画·变力——对外反应与中国近代化》,载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风云与近代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㉒《粤督张之洞奏旧金山华民被害粤省办理情形折》(光绪十二年四月十六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国官书选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47页。

㉓梁启超:《新大陆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五册,第二十二卷。

㉔胡汉民:《南洋与中国》附录,第21页。

㉕杨国标等:《美国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07页。

㉖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问题》,转引自《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221页。

㉗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6~87页。

㉘⑳冯子平:《海外春秋》,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十章“华侨捐资兴学”。

㉙《国父全集》第二册,第167页。

㉚⑳《国父全集》第三册,第430、428页。

㉛《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江苏人民

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㉜蒋永敬编:《华侨开国革命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46~47页。

㉝《广东财政司自旧历辛亥年九月十九日起至民国元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年收入总数报告册》,“外埠捐款”。

㉞钟荣光:《广东人之广东》,第15页。

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㊱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前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㊲【台】国防研究院编:《国父全书》,第1053页。

㊳《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页。

㊴罗福惠:《孙中山时代华侨的祖国认同》,载《孙中山与华侨》,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㊵广东社科院历史研究室编:《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2页。

㊶陈占勤、胡波:《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在中山市现代化建设中的体现》,《孙中山研究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㊷⑳《国父全集》第三册,第615、428—430页。

㊸据有关资料可知:1912~1919年,华侨投资的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房地产业多达1042家,投资金额达7100万元;1919~1927年,华侨投资总额为1.67亿元,平均每年投资数约为2100万元,比前一时期有了明显的增长。

㊹陈序经:《南北文化观》,《岭南学报》第3卷第3期,1934年5月版,第84~85页。

作者:528403 广东 中山

中山学院孙文研究室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平生